

“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

陈明星^{1,2}, 隋昱文^{1,2}, 陆大道^{1,2}, 刘卫东^{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当前,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均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这将对“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区域发展带来极为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分别是面向国际和国内视野的着力转型升级的新倡议和新战略,两者之间如何形成互动和融合发展是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梳理了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和当前若干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对新型城镇化的可能影响,以及新型城镇化对“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作用;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时代背景与融合发展的互动机制,全球城镇体系变化格局及其新发展,“一带一路”的空间路线图设计,与周边国家六大走廊的城镇网络体系,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参与“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节点城市和门户城市等遴选与方案设计,以及注意推动国际合作中的风险防范研究等。

关键词 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区域发展;风险防范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又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2015年3月,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5月,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次论坛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方就此召开的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来自130多个国家约1500名各界贵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论坛,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进入全面推进建设阶段。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也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不紊地推进。2013年12月,中央关于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做了重要讲话。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努力解决四大任务: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

收稿日期:2017-11-30; 修回日期:2018-01-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30636,41671125,4153063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兼维”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5RC202)

作者简介:陈明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电子信箱:chenmx@igsrr.ac.cn

引用格式:陈明星,隋昱文,陆大道,等.“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J].科技导报,2018,36(3):82-90;doi:10.3981/j.issn.1000-7857.2018.03.011

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提出以来,学术界迅速行动,相关单位纷纷成立了众多的“一带一路”研究院或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由于其学科特性也敏锐关注到并持续探讨此倡议和战略。刘卫东等^[1]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以及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等^[2]。杜德斌等^[3]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倡议,分析了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地缘战略轮廓。朱竑等^[4]组织了一期地理学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笔谈,分析了地缘政治意义,探讨了东盟地区国家间差异性并分析了地缘合作启示等^[5],归纳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的4个主要主体间共识^[6]。城镇化是地理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新型城镇化这一国家战略出台也包含着地理学者的重要贡献,对新型城镇化研究也持续跟进,产出颇丰。陆大道等^[7]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背景进行分析,刘沛林^[8]开展了新型城镇化以及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陆大道等^[9]组织了知名中青年专家对“胡焕庸线”开展了学术争鸣,陈明星等^[10-12]聚焦于对“胡焕庸线”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陈雯等^[13-14]对长江三角洲等重点区域进行新型城镇化研判。但是,到目前为止较少发现有直接聚焦“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15]。本文围绕这一问题,梳理“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大背景及新时期国家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分析“一带一路”对新型城镇化的可能影响及新型城镇化对“一带一路”的积极作用,提出推动“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科学问题。

1 新时期国家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和关系

1.1 提出背景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和黑天鹅事件频出、全球深度合作面临挑战并存。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一体化超越了国家尺度,加速了商品、资金、人员、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16]。这些全球化因素和力量正在对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空间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空间关系,扩展的交通和通信网络、贸易自由化、金融机构重组、新的区域贸易协定等重新塑造了世界商品、投资、

劳动力和政治权利等的流向^[17]。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利益纽带更加密切。然而,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的低迷态势仍在持续。2016年是黑天鹅事件频出的一年,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大选,全球化开始遭遇“逆全球化”思潮,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间和次国家尺度上不平等现象产生了不同看法,甚至对经济全球化本身也产生了置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有所抬头,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

从中国实际来看,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均面临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科技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需要建立新的全球观^[18-19]。同时,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快速提高到2016年的57.35%,城镇人口规模从1.7亿跃升至7.9亿。城镇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们生活居住条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去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模式是以数量增长为主要目标,突出强调的是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和城市等级提高等,而忽视了人的城镇化,面临着严峻的半城镇化挑战;过去城镇化发展模式也付出了巨大资源环境代价。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布,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以人为本、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此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不高和产能过剩等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积极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1.2 战略间关系

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在一定阶段国内各(类型)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格局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的概括^[20]。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和方针逐步演变:划分全国为沿海和内地时期、“三线建设”时期、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时期、划分全国为三个经济地带的“七五”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央开始重点考虑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相继实施了1999年“西部大开发”、2002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5年“中部崛起”。同时,中国在五年规划中也明确提出支持东部率先发展。由此,四大板块构成了今天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陆续提出一些新的发展战略。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十三五’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确定4+3布局”,具体而言,在“十三五”期间将确定在原有4个区域板块上,增添“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打造“4+3”格局,联通四方城市群、城市带为主的区域发展线路图^[21]。这表明当前对中国总体区域发展战略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

实际上,中国实施一系列和区域发展相关的重大倡议和战略是有不同层次的。第一层次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们并不是区域发展战略,但是都是当前国家实施的重大倡议和战略,并且毫无疑问会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带来重大影响,是构建“十三五”甚至更长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基础。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面向全球视角,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是推动国家和地区间合作与发展、促进繁荣稳定、扩大文明对话和互学互鉴的合作倡议,这也是中国的重大和长远布局,是中国对外工作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也对中国不同地区发展带来差异化影响。而新型城镇化主要是面

向国内视角,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事关几亿人生活的改善,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造福广大城乡群众,不同地区存在巨大差异,需要着力探索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和路径。第二层次是区域发展战略,包括2个系列:原来的四大板块和新时期的点线面的三方面新部署。尽管四大板块存在区域分割和重点不突出等问题和争议,然而这是对中国国土空间区域划分相对合理、也容易被大众所理解的几大板块,也利于分区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大类政策。为了克服前述的问题,国家在新的时期、在四大板块基础上,又陆续提出国家级新区的增长点战略、长江经济带的增长轴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增长区战略。这样通过点线面的空间战略布局,与原有的四大板块联通,互为促进,形成新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整体框架。因此,四大板块与点线面战略间融合发展比较而言更具有天然基础和优势,而推动“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尚未被深刻认识,亟待深入探索。此外,“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对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影响也需要研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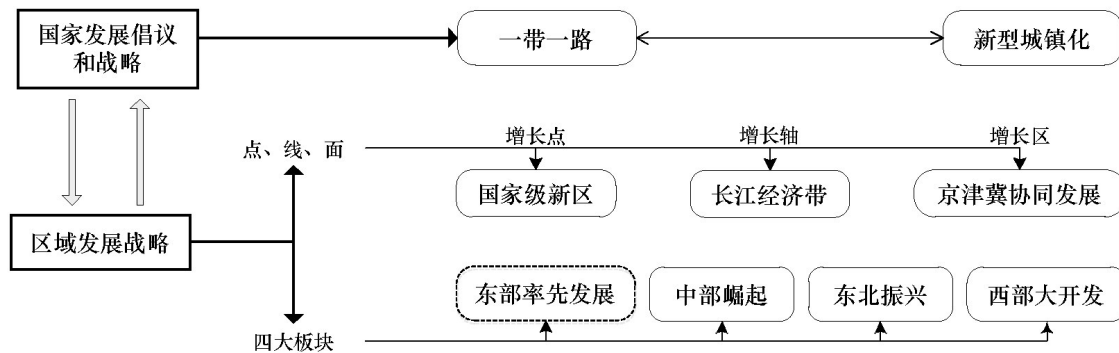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期国家与重大区域战略间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rategies in the new period

2 “一带一路”对新型城镇化的可能影响

2.1 促进中国主要城市群和重要节点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

“一带一路”致力于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家 and 地区间双多边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时期全球化的新型合作架构。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的共同利益,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截至2016年底,已有100多个国家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中国与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4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因此,“一带一路”将有效地推动中国主要城市群和重要节点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加快全球城市体系重组和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与连接,深入国家和地区间交流与和合作。其中,次国家尺度的重要城市区域(城

市群)将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中国发育程度最高、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三大城市群,2015年三大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26.16万亿元,占全国的38.17%,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着力培育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也是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重要城市来看,以全国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例,截至2015年底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77%,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40.55%,其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39.88%、46.04%,而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例达到了58.59%。上海、深圳和北京年进出口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是中国对外经贸联系的最重要节点城市,分别引领着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广州、天津、宁波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是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中心城市。厦门、重庆、青岛、杭州、郑州、大连、南京、成都、福州年进出口总额超过300亿元,是对外经济贸易的次中心城市;武汉、西安、合肥、沈阳、长春、长沙、昆明、石家庄、南昌、西宁、太原年进出口总额在100~300亿美元,是对外经济贸易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多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省会;贵阳、济南、乌鲁木齐、南宁、兰州、哈尔滨、海口、银川、呼和浩特、拉萨年进出口总额尚不足100亿美元,但是在区域性对外经济联系功能上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图2)。各级城市利用好“一带一路”时代背景,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辐射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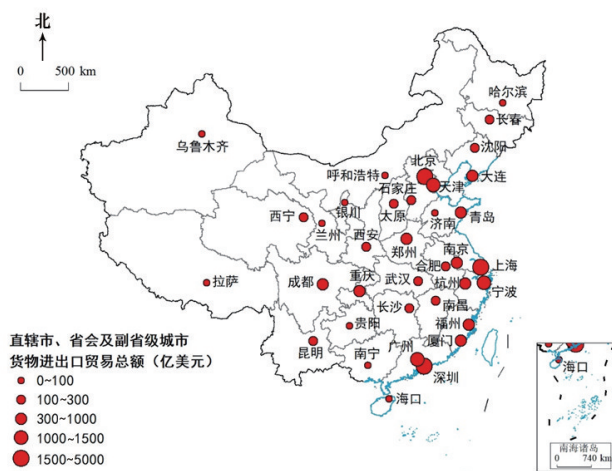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主要城市货物进出口贸易情况示意

Fig. 2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major cities in China

2.2 加快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率先参与全球贸易,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西部地区受地理区位、生态环境、自然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一直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中部地区处于东西部地区的交界位置,是东西部地区间物资流动的枢纽,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正推动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格局的重构。过去远离沿海处于改革开放末梢的西部地区也正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条件也进一步改善。中国中西部地区正在展开新一轮区域竞争与合作,将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合作开发、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等,推动亚欧经济一体化。为提升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国务院相继批准了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内蒙古二连浩特、云南勐腊(磨憨)、黑龙江绥芬河—东宁等6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经过10年左右努力,在体制机制创新、对外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成效。对于中部地区,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重点地区,打造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同时,重庆两江新区、甘肃兰州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四川天府新区、湖南湘江新区、云南滇中新区和江西赣江新区等8个国家近新区陆续设立。中西部地区大城市的发展空间和辐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要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城镇化,促进与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衔接。

2.3 提升沿边地区城镇化

增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深入合作与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的国家,与14个国家接壤,分别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与沿边国家合作潜力巨大,沿边省区成为重要前沿区域,不同省区将分别打造成面向俄罗斯、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开放的重要窗口。依靠过去以拼资源为主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一带一路”建设则意味着高水平“引进来”和

大规模“走出去”将同步推进。沿边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缘价值凸显。中国沿边地区有 271 个一类口岸,公路、铁路、内河、海运和航空口岸分别为 68 个、20 个、52 个、68 个和 63 个。“愿景与行动”提出“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口岸城市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发展边境贸易和跨国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沿边地区更多地参与国际分工,口岸城市及沿边地区将在基础设施、商贸物流、国际合作园区、跨境电商、通关便利等多方面获得发展机遇和水平提升。

2.4 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东部城镇化水平及质量均明显高出中西部地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地理学重要发现之一的“胡焕庸线”,李克强总理提出“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一带一路”建设将会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经济活力和国际化程度,吸引人口在全国合理集疏和均衡分布,促进中西部地区和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特别是具有较强对外开放度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的新一轮发展。“一带一路”将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及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形成互动,促进经济增长、市场空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有力推动全国人口和城镇化更加全面均衡发展^[5]。

3 新型城镇化对“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

3.1 城市群和城市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主要载体和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取得扎实成果。这其中,不同城市之间的人文和经贸网络具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城市群也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区域。“一带一路”不仅是国家尺度的协商和谈判,更依赖于次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的天然联系的增强和文化交流的扩大。从中国国内来看,国家各部委和多个地方政府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等纲领性文件制定了或正在制定多项规划和具体

措施,不但有国家的规划和行动纲领,地方政府也在做一些规划和落实行动,另外,目前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单打独斗的形势也不利于“一带一路”的长远开发和愿景目标实现,应该得到政府的统筹引领。而这其中,城市群和城市尺度恰符合需要,易于开展相关组织和对接工作,为“一带一路”落实提供主要载体和平台。东部地区形成许多重要节点城市,一般海铁联运条件好、港口功能强、腹地广阔、对外贸易发达、远洋航线繁多,如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宁波、大连、青岛、厦门、营口、连云港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要依托主要的港口城市,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东北亚、美洲和北非等国家经贸合作。西北地区毗邻俄罗斯、蒙古国、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应依托天山北坡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等形成向西开放的格局。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具有天然的地缘基础,将成渝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等作为向东盟开放的重要载体,加大与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交流。中部地区在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和晋中城市群等支撑下,发挥地理居中优势,建立全方位开放格局。

3.2 构建六大国际走廊城市网络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水平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实施的基础与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从最初不到 20% 快速提升至 2016 年的 57.35%,城镇基础设施水平大幅度改善,国内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管道输油(气)里程分别增加了 1.27 倍、4.15 倍、12.09 倍,形成了密集的城市交通网络,为各种客流、货物流和信息流的流通奠定了基础。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技术突破和巨大进步,并且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铁路、航空、内河航道、管道及电信、物联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会进一步得到改善,相应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也大幅度提高。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和空间布局,中国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思路,“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因此,按照“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框架指引,遴选出沿六

大国际走廊的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和港口城市,构建相应区域性城市网络。按照互联互通的要求,通过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六路”方面的基础设施水平,以促进区域性城市网络构建并推动相关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合作共赢局面。其中,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其建立初衷即支持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法定资本 1000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 5 月亚投行已有 77 个正式成员国。

3.3 新型城镇化的国际合作将推动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和产能合作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世界各国都经历过、正经历着快速发展或即将迈入中期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之中。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致力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包容等理念,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注重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虽然世界各国的城镇化所处的阶段、背景和文化大有不同,但是相互之间存在大量共通的、可借鉴的发展经验模式,也包括所走的弯路和教训。要促进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借鉴城镇化发展经验,发达国家应降低贸易壁垒,向发展中国家积极转移转化新型城镇化领域的关键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要。中国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经验和先进技术,又要通过合作、共建、技术支持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城镇化转型发展,加强绿色城市、创新城市、包容城市、智慧城市等的建设。同时,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渐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带动沿线国家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此外,“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人口总数为 32.1 亿,占全球人口的 43.4%,2016 年对外贸易总额为 71885.5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1.7%。中国新型城镇化市场空间巨大,到 202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0% 左右,新增城镇人口 1 亿左右。将围绕解决“三个 1 亿人”问题,重点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培育新生中小城市、建设新型城市“一融双新”工程。欢迎各国城市、企业和机构可以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分享中国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外溢效应。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国际合作将推动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和国际产能合作。

3.4 友好城市与国际旅游是沿线国家人文相通和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尊重各国文化习俗,在

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合作奠定坚实的民心基础,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落脚点。截至 2015 年 7 月,中国对外友好城市数量已达到 2209 对,成为世界上拥有正式友好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城市的“朋友圈”遍及五大洲,友好城市结对旨在互学互鉴不同国家在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以促进自身城市可持续发展。目前与中国结好前 3 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美国和韩国,结好城市数量分别是 249 个、244 个和 169 个。俄罗斯与中国结好城市 115 个,居第 4 位。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同时,旅游业也是促进民心相通和经济往来的重要抓手,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先导产业。2015 年中国入境外国游客数量达 2598.54 万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达 1136.50 亿美元,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排名前 10 位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浙江、上海、福建、北京、江苏、天津、山东、云南、安徽。从出境游来看,中国近年来国内居民出境人数快速增加,从 2011 年的 7025 万人增长至 2015 年的 12786 万人。

4 “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科学问题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国际区域合作模式。共建“一带一路”为学术界提出了很多科学问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当代科学家责任。其中,需要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界加强研究的议题包括: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关系的核心要素和驱动机制,沿线国家的国别地理研究等^[1]。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当前迫切需要开展的重要议题如下。

1) “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与融合发展的互动机制。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如何在新时期实现城镇化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如何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取得互惠互利的发展,其中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发生着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需研究“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如何互动互促,即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途径及其作用机制。

2) 全球城镇体系变化格局及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新发展。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发展

迅速,城市群快速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城镇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如何探究这种变化特征及其演化过程?其中,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城市网络又是如何演化的?无疑,“一带一路”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全球多双边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情景,在这种形势之下需研究全球城镇化体系可能的新发展,以及趋向逐步均衡的全球化下的南北方关系。

3) “一带一路”的空间路线图设计及与周边国家六大走廊的城镇网络体系。“一带一路”用了丝绸之路的概念,重点是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一带一路”不是要重建历史时期的跨国贸易路线。“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务实合作,在空间上还是需要设计出重点方向、先期合作区域和重要节点等,即完成“一带一路”的空间路线图的顶层设计,以促进“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目前,已经确定了五大走向与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五大走向指:从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六大走廊即上文“六廊”,其走向和廊道还是大方向的,空间尺度需要进一步细化,未来急需梳理分析出六大国家经济合作走廊的城镇网络体系,为各国各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清晰导向。

4)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倡议,因此对外开放既包括扩大与发达国家交往,也应关注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积累的不少经验、技术和区域模式,在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方面,在棚户区改造、安居保障房建设等诸多方面有着很好的基础。抓住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机遇,为中国切实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条件,未来需要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因地制宜、符合实际的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模式。

5) 中国参与“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节点城市和门户城市等遴选与方案设计。在“一带一路”提出的初期,不少地区都在争起点、桥头堡等称号,但实际上“一带一路”是国家倡议,是全国各地区都能参与和共享到红利的。当然,各地区在新的“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

化的新形式下,应重新思考和找准城市自身职能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完善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等级体系,深入开展战略对接和融合发展研究,促进自身全方位的对外合作和新的新发展。

6) 推进“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国际合作要加强风险防范研究。(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地缘环境风险,部分国家甚至还存在政局不稳定、政策动荡的风险,对于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造成很大风险。(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风险,当前气候变化较为剧烈,而且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产生较大影响,一些问题需要沿线国家共同面对,例如国际河流和水资源分配、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等均需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环境基础和承载能力。(3) “一带一路”的不同国家在法律体系、治理结构、政府信用、办公透明及效率、劳工政策、财税体系等方面有显著差异,以及在民族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别,加强风险防范和不确定性研究,最大限度降低投资合作风险,达到合作共赢。

5 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促进中国今后长期发展的国家级对外和对内两个统领性倡议和战略,两者相互交叉、彼此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新型城镇化主要立足于国内城镇化发展的新格局设计,而“一带一路”重点是构建新时代下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深化将会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促进中国主要城市群和重要节点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加快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提升沿边地区城镇化,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均衡发展。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又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城市群和城市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主要载体和平台,通过构建六大国际走廊城市网络提升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水平,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国际合作推动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和产能合作,友好城市与国际旅游则是沿线国家人文相通和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两者的联动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城镇化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解决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而,从学术研究层面,提

出“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相关科学问题,包括新时代下两者融合发展的互动机制,全球城镇体系变化以及“一带一路”下的新发展,“一带一路”的空间路线图设计以及六大经济走廊的城镇网络体系识别,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参与“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节点城市和门户城市等遴选与方案设计,以及特别需要强调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存在风险及其防范等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卫东.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38-544.
Liu Weidong.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m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5): 538-544.
- [2] 刘慧, 叶尔肯·吾扎提, 王成龙.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45-553.
Liu Hui, Yeerken Wuzhati, Wang Chenglong. Impa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erritory development in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5): 545-553.
- [3] 杜德斌, 马亚华. “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J]. 地理研究, 2015, 34(6): 1005-1014.
Du Debin, Ma Yahua.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grand geo-strategy of China's ris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6): 1005-1014.
- [4] 朱竝, 安宁, 葛汉文, 等.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一带一路”战略笔谈[J]. 热带地理, 2015, 35(5): 607-620.
Zhu Hong, An Ning, Ge Hanwen, et al. Some idea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J]. Tropical Geography, 2015, 35(5): 607-620.
- [5] 黄耿志, 张虹鸥, 王洋. 东盟内部差异性及其对中国地缘经济合作的启示[J]. 热带地理, 2015, 35(5): 613-616.
Huang Gengzhi, Zhang Hongou, Wang Yang. ASEAN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geo-economic cooperation[J]. Tropical Geography, 2015, 35(5): 613-616.
- [6] 胡志丁, 刘卫东, 宋涛. 主体间共识, 地缘结构与共建“一带一路”[J]. 热带地理, 2015, 35(5): 621-627.
Hu Zhiding, Liu Weidong, Song Tao. Inter-subjectivity consensus, ge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buildi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J]. Tropical Geography, 2015, 35(5): 621-627.
- [7] 陆大道, 陈明星. 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J]. 地理学报, 2015, 70(2): 179-185.
Lu Dadao, Chen Mingxing. Several viewpoints on the back-ground of compiling the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ning (2014-2020)"[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2): 179-185.
- [8] 刘沛林.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地理研究, 2015, 34(7): 1205-1212.
Liu Peil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remembering nostalgi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7): 1205-1212.
- [9] 陆大道, 王铮, 封志明, 等. 关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学术争鸣[J]. 地理研究, 2016, 35(5): 805-824.
Lu Dadao, Wang Zheng, Feng Zhiming, et al. Academic debates on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5): 805-824.
- [10] 陈明星, 李扬, 龚颖华, 等. 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J]. 地理学报, 2016, 71(2): 179-193.
Chen Mingxing, Li Yang, Gong Yinghua, et al.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rend of urbanization pattern on two sides of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A tentative response to Premier Li Keqia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2): 179-193.
- [11] 王开泳, 邓羽. 新型城镇化能否突破“胡焕庸线”——兼论“胡焕庸线”的地理学内涵[J]. 地理研究, 2016, 35(5): 825-835.
Wang Kaiyong, Deng Yu. Can new urbanization break through the Hu Huanyong Lin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geograp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Hu Huanyong Lin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5): 825-835.
- [12] 戚伟, 刘盛和, 赵美凤.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J]. 地理学报, 2015, 70(4): 551-566.
Qi Wei, Liu Shenghe, Zhao Meifeng. 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Hu Line and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its both side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4): 551-566.
- [13] 陈雯, 闫东升, 孙伟. 长江三角洲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与态势的判断[J]. 地理研究, 2015, 34(3): 397-406.
Chen Wen, Yan Dongsheng, Sun Wei. Analyzing the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397-406.
- [14] 朱诚, 姜逢清, 吴立, 等. 对全球变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科学问题的思考[J]. 地理学报, 2017, 72(4): 633-645.
Zhu Cheng, Jiang Fengqing, Wu Li, et al. On the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hang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633-645.
- [15] 陈明星, 刘卫东, 叶尔肯·吾扎提, 等. “一带一路”对我国城

- 镇化发展格局的影响[J]. 山地学报, 2016, 34(5): 637-644.
- Chen Mingxing, Liu Weidong, Yeerken Wuzhati, et al.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J]. Mountain Research, 2016, 34(5): 637-644.
- [16] Dicken P. Global shift: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M]. London: Sage, 2003.
- [17] 刘卫东, 张国钦, 宋周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研究[J]. 地理科学, 2007, 27(5): 609-616.
- Liu Weidong, Zhang Guoqin, Song Zhouying. Trend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 evol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 globalizat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27(5): 609-616.
- [18] 陆大道. 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与全球战略[J]. 地理科学, 2016, 36(4): 483-490.
- Lu Dadao. The global concept and strate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alysis on the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4): 483-490.
- [19] 陈明星, 龙花楼, 王成金, 等. 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变化大背景下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高层论坛综述[J]. 地理学报, 2016, 71(8): 1456-1471.
- Chen Mingxing, Long Hualou, Wang Chengjin, et al. The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The overview of "high level forum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ang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8): 1456-1471.
- [20] 陆大道. 关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方针的若干问题[J]. 经济地理, 2009, 29(1): 2-7.
- Lu Dadao. Several issues regard to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pproach[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29(1): 2-7.
- [21] 杨泥娃. 十三五区域发展确定4+3布局 体现各自区域优势和特色[EB/OL]. (2015-09-23)[2018-11-20].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923/230523331427.shtml>.
- Yang Niwa. Thirteen F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determined 4+3 layout Show the area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EB/OL]. (2015-09-23)[2018-01-03].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923/230523331427.shtml>.

On the fusion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CHEN Mingxing^{1,2}, SUI Yuwen^{1,2}, LU Dadao^{1,2}, LIU Weidong^{1,2}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strategies are being fully implemented, which will bring a long-term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new urbanization are new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rategies facing home and abroad, and how to integrate the two strategi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worth considering. This paper combs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rategies in recent years.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l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supporting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everal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new urbanization, includ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times background and fusion development, change patterns and new development of global urban system, design of spatial roadmap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rban network system with surrounding countries of the six corridors,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hub city, the selection and program design of node city and portal city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tudy on risk prevention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risk prevention ●



(责任编辑 王志敏)